

中国摄影史

中国摄影师 1844—1879

[英]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摄影史

中国摄影师1844—1879

[英] 泰瑞·贝内特 著

徐婷婷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 / (英) 贝内特 (Bennett, T.) 著；徐婷婷译. --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 3

书名原文：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
ISBN 978-7-5179-0083-2

I. ①中… II. ①贝… ②徐… III. ①摄影史—中国—1844~1879 IV. ①J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0571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14-1624号

Copyright © Terry Bennett, 2013

Original ti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 Published by Bernard Quaritch, 2013

Chinese Edition ©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14

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

作者：[英] 泰瑞·贝内特

译者：徐婷婷

出品人：赵迎新

责任编辑：常爱平

版权编辑：黎旭欢

封面设计：衣 钊

出版：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100007

发行部：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www.cpph.com

邮箱：distribution@cpph.com

印刷：中印集团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2

印张：34

字数：625千字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79-0083-2

定价：2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这套丛书共有三卷，讲述的是1879年以前摄影在中国发展的经过。19世纪80年代以后，湿版摄影术被操作更简单、成本更低廉的干版摄影术取代，摄影师也因此大幅增加，商业摄影师和业余摄影师的阵容都以几何速度增长着。此后的摄影史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内容更多，篇幅也会更长。不过，虽然这部分历史充满趣味，却不是本套丛书的研究对象。本套丛书着力于研究早期中国摄影史。第一卷《中国摄影史：1842—1860》

（英文版2009年出版，中文版2011年出版）从追述第一架银版相机在中国使用的文献记载开始写起，对中外摄影师都有涉及；第二卷《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英文版2010年出版，中文版2013年出版）衔接着第一卷末尾的内容，记述了西方摄影师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本次出版的第三卷是最后一卷，在内容上与第二卷互为补充，聚焦的对象是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摄影师。需要说明的是，本卷没有一个严格的研究时期的下限，有一些照相馆在1880年之前就已开张，19世纪80年代之后还在经营，也被收录进来。在内容上，本卷对前两卷中涉及的中国摄影师的材料进行了补充、修正，此外，还对19世纪时西方人对中国摄影的理解，以及摄影术在中国起步、逐步为人接受的过程进行了一些探讨。书末附有一表，列出了三卷本中涉及的全部摄影师的简要信息，可算是总结。

前两卷书中的地名及一些专名大多采用旧时英文拼法（比如把北京拼做“Peking”而非“Beijing”），仅在其首次出现时在括号中标注今日对应的拼法。若地

名和专名出自引用文献，则一律保留原拼法。这样的处理可能为读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对行文的一致性也有干扰，但为求规范统一，本卷将延续这一处理方式，在此恳请读者谅解、海涵。本卷中引用文献在每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此后用缩略名。书目在书后“参考文献”一节中集中列出，书籍出版物附有出版地、出版商及版本信息。相关档案、名录、图录、报纸及其他期刊的引用情况则不再重复。

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我曾提到了中国早期摄影师的相关史料在本土稀缺的情况。截至英文版付梓，中国仍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摄影博物馆，中文参考书的数目和丰富程度也比不上英文文献。那些最早拍摄的中国影像也多收藏在美国和欧洲。西方学者的研究很难绕过家族档案，但常用的家谱查询工具在中国很难派上用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社会动荡，不少照片、书籍、报章和其他种种文献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难免会对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摄影史这一任务的可操作性抱有怀疑，即便是仅仅着眼于记述几位最杰出的摄影师的成就，也绝非一蹴而就之事。

不过，纵然现状如此，我仍然坚信，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摄影史这一研究领域会获得显著发展。在本丛书出版之前，前人曾发表过两本奠基性的著作：一本是克拉克·沃斯维克先生（Clark Worswick）的《大清旧影：1850—1912》（*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一本是奈杰尔·卡梅隆先生（Nigel Cameron）的《外国摄影师和旅行者眼中的中国：1860—1912》（*The Face of China as Seen*

by *Photographers and Travellers 1860—1912*)。两本书的出版日期都是1978年。正是它们激发了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两本书在当时都收纳了一些最新的信息，今日读来，更令我感慨它们将对此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起到十分深远的影响。这几年，学界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2011年，我在撰写这套丛书期间，亦有两本很重要的出版物面世。其一是菲利普·萨克迈尔 (Filip Suchomel) 与玛萨拉·萨克美拉娃 (Marcela Suchomelová) 的《早期照片中对中国的理解及中国图像》 (*Perception and Image of China in Early Photographs*)，书中刊登了大量由海因里希·华拉 (Heinrich Wawra, 1831—1887) 和欧文·杜布斯基 (Erwin Dubsky, 1839—1909) 收藏的照片，这些照片内容丰富，迄今仍不太为人所知。其二是杰夫瑞·寇迪 (Jeffrey W. Cody) 与弗朗西斯·特帕克 (Frances Terpak) 编辑的《丹青与快门：中国早期摄影》 (*Brush &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拙作有多处引用此书。

最后我想说，研究西方摄影师的生平情况，总有很多线索可查，但研究中国摄影师，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生平信息很难勾勒，研究很难获得新进展。相信未来的研究者定会发掘出更新、更有趣的信息，并对本书内容有所补正。如果拙作尚能对后来者有所启发，或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贡献，最终出现丰硕的成果，也总算不枉费光阴了。

泰瑞·贝内特
2013年3月

致 谢

感谢我的朋友、熟人和学者们的帮助，让本书能更好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我尤其要感谢：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Robert Bickers、C. vonder Burg、Chan Wing Wa、Douglas Fix、Barbara Giordana、Peter Hibbard、Serge Kakou、Bjarke List、Gael Newton、Michael G. Price、Michael Pritchard、Howard Ricketts、Marcel Safier、Carl Smith、Ed Stokes、Frances Terpak、Roger Ward、Clark Worswick、Derek J. Wright、Roberta Wue。

就定位和翻译中文史料的工作，我特别要感谢Au-yeung Po To、陈申、古峰、黎健强、李海巍、Roy Sit Kai Sin、谭金土、仝冰雪、Wong Siu Yin、徐家宁、徐婷婷和张克平。

图片来源：

笔者收藏

汤姆·伯内特

陈申

中国摄影家协会

佳士得图像有限公司

费德廉

弗莱德和蔡威利收藏

盖蒂研究院

古峰收藏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

塞尔日·卡库收藏

康奈尔大学卡尔克劳图书馆

华盛顿国家档案局

纽约公共图书馆

苏格兰国家摄影收藏

仝冰雪收藏

威尔逊摄影中心

徐家宁收藏

目 录

前 言	vii	第五章 摄影在北京	51
致 谢	ix	导 论	
第一章 摄影术在中国的开端	1	杨 昉	
战争与中国摄影活动的开端		周 某	
第二章 中国人对摄影的回应	11	王 某	
迷信、妖术和对摄影的恐惧		第六章 摄影在香港	65
宗教与摄影		导 论	
排 外		黎芳与阿芳照相馆	
“西方”与“中国”		1890年之后的阿芳照相馆	
中国人对摄影的接受		宜 昌	
邪恶的洋鬼子和照相术		琯 纶	
迷信阻碍照相在中国普及		梁时泰 (See Tay)	
精英、中国与摄影		日 成 (Hing Qua John & Co.)	
摄影与休闲文化		介 石 (Kai Sack)	
慈禧太后与摄影		和 昌 (Wo Cheong)	
结 论		香港的其他中国照相馆	
第三章 中国商业摄影	31	第七章 摄影在广州	111
第四章 中国摄影	41	广州及通商口岸章程	
肖像摄影		摄影在广州	
风景摄影		第八章 摄影在上海	123
结 论		第九章 摄影在福州	149
		第十章 摄影在厦门	215

第十一章 摄影在汉口	239
第十二章 摄影在天津及其他通商口岸	257
芝罘(烟台)	
宁波(宁波)	
汕头	
九江	
南京	
第十三章 摄影在澳门	273
第十四章 摄影在台湾	279
李康泳(Lie Khong Tek, ?—1905)	
周志本(Choh)	
附录1 中国名片小照	291
附录2 鉴别阿芳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311
附录3 约翰·汤姆逊论香港摄影师	325
附录4 伊萨克·泰勒·何德兰论摄影在 中国的发展情况	329
附录5 通商口岸人口统计	333
参考文献	334
摄影术语	353
中国摄影年表(截至1879年)	357
中国摄影分区年表(1842—1879年)	365

摄影师索引	377
刊名对照(摘录)	395

第一章 摄影术在中国的开端

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部西方科技在东方传播的历史。“照相”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3到5世纪，墨子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的光学现象，还与弟子们进行过探讨，指出在中国“小孔成像——摄影术的光学基础——第一次被发现”。¹中世纪时，沈括（11世纪）和郭守敬（13世纪）的研究笔记中曾涉及了“影画器”（camera obscura）的基本科学原理。中国人对“影画器”相关科学知识的掌握比西方要早了好几个世纪。²

在欧洲，“影画器”在16世纪初才问世。此后几百年，西方人对光学的探索进展很快。³截至19世纪初，西方人已尝试了几种把光学仪器中呈现的影像留存下来的办法，这些都可以算作现代摄影术的雏形。因此，

也可以说，摄影术的开端是多元化的，“成像”办法并不仅有一种。⁴不过，在这里为了实际讨论的方便，我们仅谈谈其中的“达盖尔摄影术”。达盖尔摄影术是世界上首例取得商业成功的摄影术，它在1839年1月于法国宣布成功，于当年8月公之于众。⁵此后，它在欧洲的传播就不可遏制。发明者达盖尔为这项技术印发了多种文字的操作手册，还亲自对公众进行技术普及讲座，这让摄影术一时成为坊间报头的热门话题。不久，达盖尔相机也迅速问世。艺术家们兴致勃勃地带着这个新设备去世界各个角落旅行、拍照。当年11月初，法国画家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就带着相机去了埃及。⁶9月中旬，新发明问世的消息传到美国，人们对

1 Edwin K. Lai, 'The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and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 in *Brush &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 ed.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2011, p. 19. See also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 1, Physics, 1962, pp. 81–6. The relevant passage in the Mohist text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referring to the camera obscura with pinhole aperture, but it is ambiguous and could alternatively be describing the principle of image inversion in the concave mirror. See A. C. Graham and Nathan Sivin,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Mohist Optics (ca. 300 B.C.)', in *Chinese Science: Explorations of an Ancient Tradition*, ed. Shigeru Nakayama and N. Sivin, 1973, pp. 120–5, 139; A. C. 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1978, pp. 376–8.

2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Mathematics*

3 For the camera obscura and photography, see Geoffrey Batchen, *Burning with Desire: The Conception of Photography*, 1997, pp. 78–90; Mary

Warner Marien, *Photography and Its Critics: A Cultural History, 1839–1900*, 1997, pp.21–6. For its discovery by the Arab mathematician, Alhazen (965–1040) and its rediscovery in the Wes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see Hans Belting, *Florence and Baghdad: Renaissance Art and Arab Science*, 2011, pp. 95–7, 124–8. See also Olivier Darrigol, *A History of Optics from Greek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12, pp.1, 24–6.

4 See Batchen, *Burning with Desire*, pp. 24–53.

5 Stephen C. Pinson, *Speculating Daguerre: Art and Enterprise in the Work of L. J. M. Daguerre*, 2012, pp. 4–5, 227–8, 231–3. For this and the beginnings of photography in Europe, see also, e.g., Mary Warner Marien,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2010, pp. 1–31.

6 Helmut and Alison Gernsheim, *L. J. M. Daguerre: The History of the Diorama and the Daguerreotype*, 1968, pp. 98–109, 198–205. For Vernet, see also Ken Jacobson, *Odalisques & Arabesques: Orientalist Photography 1839–1925*, 2007, pp. 15, 275.

拍照的热忱超出想象。9月30日，纽约就开了一个照片展。⁷在英属印度，摄影术的传播也很迅速。1839年12月，《孟买时报》（*Bombay Times*）就对达盖尔的发明进行了大篇幅报道；1840年1月，达盖尔相机开始在当地销售；3月5日，《加尔各答信使报》（*Calcutta Courier*）报道了当地亚洲协会举办的一场照片展。⁸

在中国，1839年10月19日，澳门的英文报纸《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沃尔什（Mr Walsh）的通讯员文章，记述了他参观达盖尔工作室的经历：“只要用阳光照射十分钟，就能成像。画面非常精细，简直难以形容。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雨中的塞纳河，码头、桥梁、建筑无不历历在目，让人喜出望外，远远超过了画师所能达到的水平。”⁹1839年12月14日，该报还刊发了英国摄影先驱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伯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的“塔尔伯特摄影法”问世的消息。次年4月25日，报道了另一摄影术在德国的发明情况。¹⁰从这些报道里可以想见，当年席卷全球的摄影热潮在中国也风行过。只是个中细节，我们今日已无法了解。达盖尔相机在中国最早的使用记录是在1842年7月16日。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尾声，拍照的是英国军官麻恭少校和伍斯纳姆医生，拍照经过恰好被当时尚年轻、后来晋封爵位的巴夏礼记录下来。巴夏礼那时在英军中做见习翻译。他所在的舰队正沿着长江逼近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

7月16日，周六。天气异常炎热。船还停在码头。昨日情况如下：“弗兰格森号”（Phlegethon）和“美杜莎号”（Medusa）正在圔山（Tsien Shan）附近江面巡逻……不幸被一枚十二连发炮弹击中……角度是迎光105°，背

光95°，冷水80°。船身中弹，感觉很明显。四点半左右，我在岸边散步，顺便冲凉。6点前后，回到舰上。麻恭少校和伍斯纳姆医生已经完成了今天的照相任务。我对他们用的达盖尔相机不太了解：他们把一片抛光的金属版迎着太阳，再借助玻璃和其他一些材料，就可以原样记录下眼前所见，然后再施以药剂，影像就可以保留多年。这项技术太神秘了，纵有文字描述也只是徒劳。后来，我在凉爽的甲板上睡着了。¹¹

根据英海军罗赤上尉（Granville Loch）的记录，麻恭和伍斯纳姆二人拍照的地方大约在今天江苏镇江的圔山一带（罗赤称之为“Se-shan”）。7月14日，清军的炮台被英军攻陷（巴夏礼错过了此役，他在7月15日才抵达圔山），罗赤用文字对圔山地形和英军与当地百姓的接触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圔山地理位置显要，风景独特，这可能是吸引麻恭和伍斯纳姆拍照的主要原因。

7月14日，舰队返航。舰队途经镇江府报恩塔、繁华的城市和大运河南端的八旗军营。船行圔山一带时，被敌方炮弹击中。炮弹从山上高处发射下来，离我们只有7英里远……

江水迂回，离圔山时近时远；最后才看清圔山的全貌，那里山势陡峭，峭壁直入江中……

4点左右，离圔山越来越近。它背江的一侧平地隆起，大概有122米高，江水从中切过，形成一个山谷。两座炮台就建在那里……

我随冲锋队登陆，去摧毁炮台。那里有很多临时炮篷，地上散落的都是火药，炮台后面还埋了很多药箱……及其他军火补给。营帐里有很多

7 Keith F. Davi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hotography 1839–1885: From Daguerreotype to Dry-Plate*, 2007, p. 16.

8 Christopher Pinney, *The Coming of Photography in India*, 2008, p. 9.

9 Article illustrated by Lai,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fig. 1 (p. 21).

10 Lai,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p. 20.

11 Quoted from Parkes’s journal in 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 1, Consul in China*, 1894, p. 31. Tsien-shan was a few miles upstream from Se-shan, near Kin-shan, or Golden Island. Parkes went on to pursue a long career as a diplomat in China and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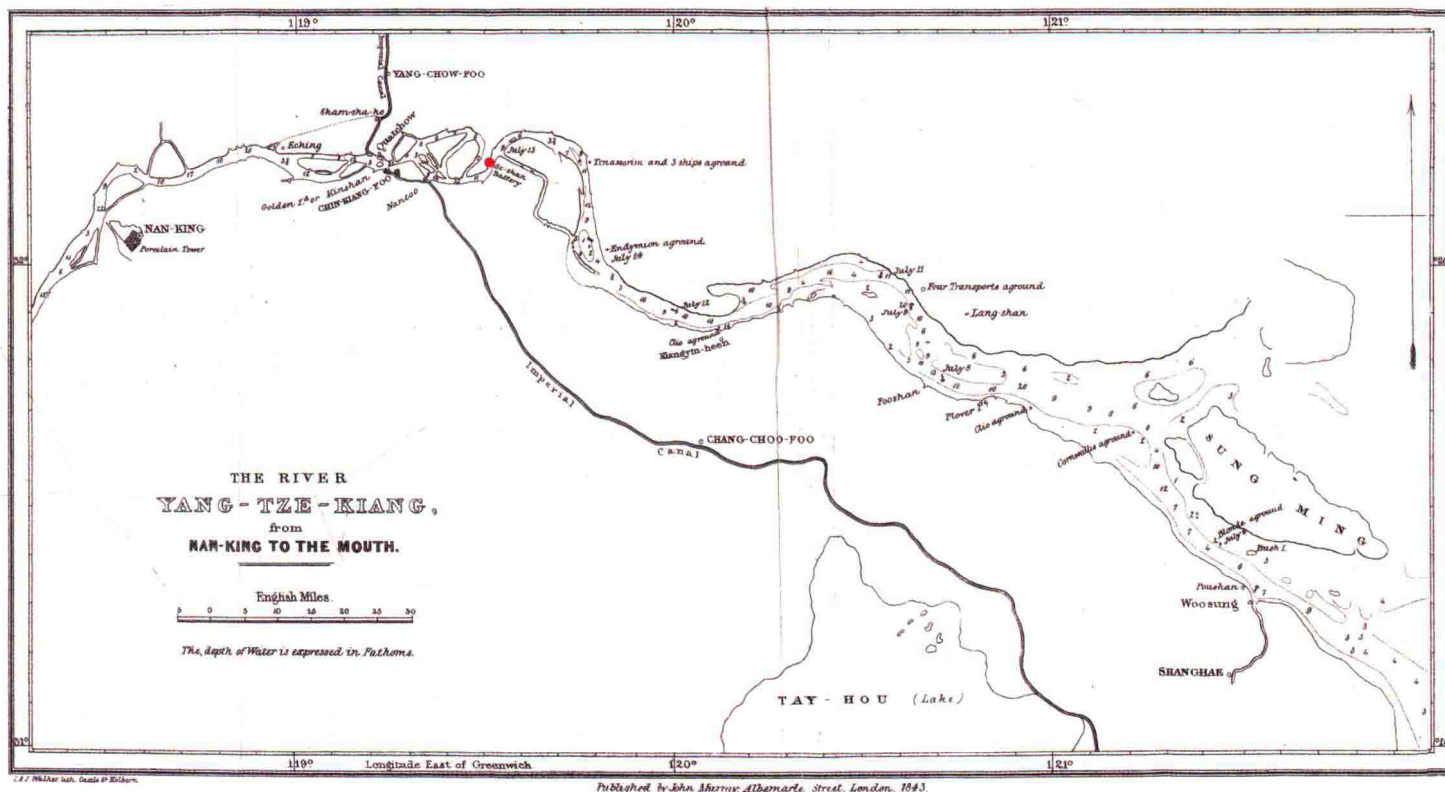


图1.1 1842年，英军舰队在长江的航路图。石版印刷，地图。摘自罗赤《中英战役尾声实录》（*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1843*）。图中红点标注为圖山，即麻恭和伍斯纳姆在1842年7月16日拍照的地方。银版相机在中国被首度使用的地点就在这里。

吃了一半的米饭和蔬菜，几匹马，据此看来，士兵刚仓皇逃走不久。

冲锋队继续搜寻，我爬上山坡，看到一面残兵的旗子……山顶风景格外开阔。西南方是一片乡村田园，还有小湖星罗密布。脚下是滔滔江水。我们的舰队变得很渺小。近处是一片沼泽，水面浩荡，很难辨清哪里是大江，哪里是支流。俯瞰万顷水面，耕田和河流绵延在一起，沿河有柳树和农舍。西边是镇江府报恩塔，若走水路，大概会有八到十英里远。夕阳西下，水雾蒸腾，远景慢慢湮灭看不清了。¹²

英国舰队大多是帆船。7月16日，天气不好，船队

不能前行，便在圖山休整。可能就在休整期间，麻恭和伍斯纳姆才有空闲上岸拍照。巴夏礼的日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罗赤的记录如下：

16日，有风。截至今日，我们沿江而上，一直都是顺风。不过今天风向大变，很不稳定。我们距离大运河只有不过10英里之遥，奈何风向不予我便，只好原地徘徊。傍晚，我和华生上校（Captain Watson）在河边散步，太阳刚落

12 Granville G. Loch,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The Operations in the Yang-tze-kiang; and Treaty of Nanking, 1843*, pp. 72-5.

山，很清凉，我们决定去离岸边很近的一座宝塔 [译者注：报恩塔] 那里看看。那里离江岸边大概只有2英里远。我们绕过炮台，经过一片安静的小村庄。人们坐在家门口的小凳上吃晚饭，晚饭是米饭和鱼。他们见到我们，有说有笑，很是自信大方……¹³

罗赤的文字大概与麻恭和伍斯纳姆拍摄的内容很接近。遗憾的是，这些照片已无下落，也没有版画留下。也很有可能他们二人的拍摄并没有成功。¹⁴（罗赤在文章几次提到麻恭和伍斯纳姆，但都没有提到照相一事。）

1844年8月15日，于勒·埃及尔随拉尊尼率领的法国赴华外交使团抵达澳门。埃及尔是名摄影爱好者。10月18日和19日，他在澳门拍了一些银版照片。10月24日，他携相机去黄埔拍摄了《中法条约》签订时双方代表的合影，其中包括钦差大臣耆英。10月29日，法国人到了广州，埃及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1月，拍了不少照片。11月25日，他随团返回澳门。12月10日，拉尊尼离开中国，前往马尼拉。¹⁵他拍的银版照片现存10多张，有人像照片，也有风景照片，是现存最早的一批

在中国拍摄的照片。¹⁶

除了军官和外交家，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拍过照片。1846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从波士顿订购了一批银版摄影器材运到广州，可惜至于他是否会拍照，没有其他线索留下。¹⁷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 1803-1856）于1842年7月11日抵达上海吴淞口。与他同行的艾方济神甫（François Estève）和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主要负责上海一带传教事务，南格禄则负责整理早期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档案，和当地华人的士绅阶层多有接触。1847年，他还在上海郊区的耶稣会天主堂旁边创办了徐家汇藏书楼。¹⁸南格禄曾在法国佛里堡（Fribourg）教过自然科学，来华时还随身带了不少科学仪器，¹⁹或许曾向中国人演示过摄影术。据称，他在19世纪50年代时在上海拍过照片，²⁰1844年时，曾携相机到过澳门。²¹这种说法有可能是把他和埃及尔搞混了，不过也有可能成立。因为法国耶稣会士到澳门稍早，且由于清朝对洋教有种种限制，南格禄需要经常和中国人打交道。²²1856到1857年间，天津一带的传教士圈里也有一名摄影师活动。²³随着人们对传教士档案的深入研究，可能还会有更多材料浮出水面。²⁴

13 Loch,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pp. 76–7.

14 For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daguerreotypists working outdoors and early expeditionary photography, see Martha A. Sandweiss, *Print the Legend: Phot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West*, 2002, pp. 23–4, 90–93.

15 Jules Itier,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vol. 1, 1848, pp. 243, 321, 325–6, vol. 2, 1848, pp. 5, 113–15, 123, 131. Itier's *Journal* includes two lithographs of his China daguerreotypes, 'Maison de campagne de Pan Tsen Chea, près Canton' (vol. 1) and 'Vue de la ville flottante de Canton' (vol. 2).

16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3–6.

17 See Bennett,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pp. 379–382 (Appendix 12).

18 Gail King, 'The Xujiahui (Zikawei) Library of Shanghai',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2, no. 4, Fall 1997, pp. 458–9.

19 *Dictionnaire de biographie française*, vol. 7, Gilbert–Guérout, 1985, cols 672–3.

20 Lai,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p. 23 (citing, n.29, Hu Zhichuan and Ma Yunzeng, eds, *Zhongguo sheying shi 1840–1937*, Beijing: Zhongguo Sheying Chubanshe, 1987, p. 16).

21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Through a Foreign Glas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hotography in Late Qing China', in *Brush &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 ed.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2011, p. 63 (n.13, citing Hu and Ma, *Zhongguo sheying shi 1840–1937*, p. 16).

22 Louis Wei Tsing-sing, *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 L'ouverture des cinq ports chinois au commerce étranger et la liberté religieuse*, 1960, p. 257.

23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 78.

24 The sources (including manuscript archives) for missionary history in China are surveyed in R. T.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 to the Present*, 2010, pp. 1–114.



图1.2 于勒·埃及尔。广州全景，1844年11月。达盖尔摄影法。法国摄影博物馆，比耶夫雷。

与早期这批从事摄影活动的西方人士几乎同时活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是广东人邹伯奇（1819—1869）。邹伯奇是一位科学家、数学家，对小孔成像等光学现象都有研究。²⁵1844年时，他已制作了一架盒式相机，并完成了《摄影之器记》这篇专著，对照相的光学原理作了描述。邹并没有提到如何定影，不过他用玻璃版拍了好几张人像照片。邹的摄影术有可能是自创，至于他有没有受西方科学的启发，还有待证据证实。²⁶邹对西文科技文献有所接触，他还提到过西方光学源自中国古代墨子的理论，且在书里展示了一批光学仪器。²⁷

19世纪时，中国人对光学的兴趣大增。²⁸邹伯奇对照相术钻研很深，在其他领域，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也并不落后。郑复光（1780—1853）就曾在1846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光学论著，其中一章还提到了“绘画辅助用具黑匣”，并辅以插图，即为西方人所用的“影画器”。²⁹郑复光的旧友、科学家黄超之女黄履还曾自造了一架特殊的“镜匣”（*cameral lucida*）。她的镜匣据说与众皆

异，有四组镜头，“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景，平列其上，历历如画。”不过，就戴维·莱特（David Wright）的研究来看，黄履的镜匣究竟是只能成像，还是同时能够拍摄照片，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有可能这架仪器甚至指的是红外成像仪。³⁰

据此分析，在西方人来华之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示中国人已经掌握并且能传授把光学成像定影的办法。如黎健强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邹伯奇曾用他所发明的镜匣画画、绘图，但从现存线索看，邹伯奇在拍照时似乎用的是湿版法，而在西方，湿版法取代银版法和卡罗式摄影法，并逐渐得到普及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³¹考虑到邹是广东人，他很可能知道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美国人乔治·韦斯特在这一带拍照的事，³²也有可能受他们启发，对西方摄影术多少有所了解。邹伯奇不一定与这两位摄影师直接打过交道，但他的朋友很有可能认识这些外国人。比如，1844年11月，埃及尔就拍摄过广州外销画家关乔昌，还向他展示

25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6–9; Oliver Moore, ‘Zou Boqi on Vision and Photograph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Human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a*, ed. Kenneth J. Hammond and Kristin Stapleton, 2008, pp. 33–53. For Chinese studies of Zou Boqi, see Lai,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p. 30 (n.7).

26 See Moore, ‘Zou Boqi’, pp. 40–1, 46–8. *Sheying zhi qi ji* was printed in 1873, after Zou’s death.

27 For Zou Boqi and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origins of Western science, see Iwo Amelung, ‘Naming Physics’,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2004, pp. 394–7, and ‘Weights and Force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chanics into Late Qing China’,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2001, pp. 213–5; David Wright, *Translating Science: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 1840–1900*, 2000, pp.16–19. More generally, see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2005, pp. 150–89, 341–2. The West’s debt to Chinese science, including Mohist precedence in optics, continued to be debated and was the subject of several essay topics in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introdu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8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 1, Physics, pp. 117–18.

29 Moore, ‘Zou Boqi’, p. 42; Wright, *Translating Science*, p. 24.

30 Wright, *Translating Science*, p. 25, quoting and translating from Chen Wenshu, *Xiling guiyong* (Women’s chants from Xiling), 13.7a in *Wulin zhanggu congbian* (The Wulin historical collection), 1887, 72 ce. For a brief biography, see Clara Wing-chung Ho,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1998, pp. 81–2, which calls Huang Lu (Yingqin) the ‘first woman in China to work with optics and photographic images’ (giving her dates as ‘fl. 1769–1829’, surely too early).

31 Lai,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p. 19.

32 For West in China, see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6–7.



图1.3 佚名。中国南方女人，约1850年。达盖尔摄影法。笔者收藏。

过银版摄影术。³³作为回礼，关乔昌还按银版小照绘制了一幅肖像画。³⁴同年，在关乔昌工作坊所在的“新中华街”（New China street）的转角，一家中国店里摆放了一架银版相机作为展示。³⁵这件事在当时恐怕影响不小，邹伯奇也可能有所耳闻。

33 For Lam Qua (Guan Qiaochang, b. 1801), see Patrick Conner,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Artist of India and the China Coast*, 1993, pp. 169–70, 263–8;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1991, pp. 72–104.

34 Itier, *Journal*, vol. 2, p. 74 (entry for 14th November 1844). See also, Cody and Terpak, ‘Through a Foreign Glass’, p. 35.

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对照相的接受情况来看，摄影术在当时应该刚刚传入中国不久。比如，埃及尔就描述过1844年10月和11月间他在澳门和广州拍照的情景。中国人普遍对照相技术感到很震惊。³⁶1846年，湖南学者周寿昌这样描述他在广州见到的拍照一事：

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东面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³⁷

1849年10月，美国人本杰明·林肯·鲍尔（Benjamin Lincoln Ball）途经厦门，他描述，一位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在和几位中国官员喝茶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家人的银版小照，他们“佯装不以为然”，实则对摄影术完全不了解，“对艺术也是门外汉。”³⁸

除了邹伯奇外，广东新会人罗以礼（1802—?1852）也是一位重要的早期中国摄影先驱。他有两幅作品传世，其中一幅为自拍像。不过对他的拍照活动，以及此作品的拍摄时间、技术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³⁹几年

35 Osmond Tiffany, *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1849, p. 242. Cody and Terpak, ‘Through a Foreign Glass’, p. 67 (n.133) suggest the makeshift studio described was probably George West’s.

36 See Itier, *Journal*, vol. 1, pp. 321, 325–6, 331, and vol. 2, pp. 113–14, translated in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3–6.

37 See Itier, *Journal*, vol. 1, pp. 321, 325–6, 331, and vol. 2, pp. 113–14, translated in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3–6.

38 Benjamin Lincoln Ball, *Rambles in Eastern Asia, Including China and Manilla*, 1855, p. 337.

39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 74; Shi Chen, ‘Early Chinese Photographers from 1840 to 1870: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tography’, 2009, pp. 13–15.

后，在19世纪60年代初，邹伯奇之友吴嘉善（?—1879）对摄影术也有接触，还给别人讲解过拍照知识。⁴⁰

广州南海人罗森（约1821—约1899）是位有眼界、颇善开拓的商人，且通文字。1854年，他曾在香港为美国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担任助手。卫三畏是1854年赴日的佩里舰队的翻译。⁴¹该舰队中配有一名专职摄影师，名叫小伊利法特·布朗。⁴²罗的英文想必不差，但他与布朗似乎并无往来，⁴³且并未留下与自己拍照有关的任何文字。⁴⁴罗在日记中描述过佩里舰队的摄影活动，以及西方人进入横滨后对日本人展示的一些科技发明：

次日，亚国以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日影像、耕农具等物赠其大君。……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⁴⁵

5月中旬，在函馆的一个寺庙附近，

提督 [译者注：即佩里] 遣人于此 [译者注：函馆（旧称箱馆），护国山上寺庙]，绘照日影像，以赠各官。⁴⁶

战争与中国摄影活动的开端

摄影术是伴随着战争传入中国的，在时间上与西方的入侵同步。因此，相机和照片在中国人心中很自然地会和西方强权联系在一起。⁴⁷比如，英国中将格兰特就曾描述，1860年，当费利斯·比托为签署战败条约的恭亲王拍照时，恭亲王面对相机，“面色死灰”，“担心这个机器可能随时夺取他的性命。”⁴⁸诚如学者所说，这一刻，双方间存在着一种“殖民地式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比托的所有照片里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对权力的行使感：何时按下快门，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角度，每个人在构图中的位置，都由比托决定。⁴⁹不过我想说的是，此刻，大清的天子已经逃离北京避难，恭亲王作为战败方的代表，自然会恐惧。⁵⁰而且，按快门、决定构图总是摄影师的使命，不论何时何地，面对顾客，他们总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面对相机，恭亲王的恐惧与第一次拍照的德国贵胄的感觉其实并无二致。德国肖像摄影师卡尔·道腾代（Karl Dauthendey, 1819—1896）的儿子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父亲在19世纪40年代给公爵拍照的

40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74, 76. For a diagram of Zou Boqi and Wu Jiashan's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ircles, see Natascha Vittinghoff,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the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Mapping Meanings*, ed. Lackner and Vittinghoff, p. 112.

41 De-min Tao, 'Negotiating Language in the Opening of Japan: Luo Sen's Journal of Perry's 1854 Expedition', *Japan Review*, vol. 17, 2005, pp.95–8.

42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43–6; Chen, 'Early Chinese Photographers', p. 13.

43 E.g., Hu and Ma, *Zhongguo sheying shi 1840–1937*, pp. 21–2, as cited by Lai, 'The History of the Camera Obscura', p. 20 (n.17, p. 30). For Brown, see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43–6.

44 Chen, 'Early Chinese Photographers', p. 13.

45 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Francis L. Hawks, ed.,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vol. 2, 1856, p. 401.

46 Hawks, *Narrative*, vol. 2, p. 405.

47 See, e.g., David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1999, pp. 17–19.

48 Henry Knollys,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 1875, pp. 209–10. This photograph failed due to inadequate light, but Beato was successful in portraying the prince a few days later. See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p. 151, 154 and fig. 62 (p. 82).

49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p. 28.

50 For the view that the Western relationship to China was nevertheless 'colonial' in the broader, cultural sense, see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003, pp. 346–9, and for photography as a 'tool of empire', Hevia, 'The Photography Complex: Exposing Boxer-Era-China, Making Civilization', in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 Rosalind C. Morris, 2009, pp. 82–93.

情景：“当我父亲架好相机，把镜头指向公爵时，他变得非常紧张焦虑……相机和那伸出的黄铜镜头像一架死神控制的机器。”道腾代也被公爵视为催命鬼之类的人物。⁵¹

19世纪中叶，相机仍然非常笨重，很难用来直接近距离拍摄战争场面。比托在1860年拍摄的大沽炮台的照片是拍摄战争过后死亡场面的首批影像。当时在西方，拍摄尸体还未为法律禁止，⁵²不过即使这样，比托的照片也很特殊。五年前，罗杰·芬顿拍摄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照片，但画面里很少有阵亡的士兵（包括交战双方）。⁵³比托之所以这样拍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作为交战的一方，在当时并未得到西方敌人的尊重；另一方面，这也与两位摄影师截然不同的性情有关。比托眼光敏锐，善于捕捉到画面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但芬顿是一位有着绅士风度兼艺术家气质的摄影师，虽然同样名声在外，同样注意拍摄细节，却含蓄内敛得多。⁵⁴再次，两场战争的战场情况也不尽相同。比托同样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拍摄。当时他为摄影师詹姆士·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担任助

手。⁵⁵他们拍摄的照片在风格上和拍摄手法上与芬顿区别很大。罗伯逊和比托比芬顿更重视拍摄狼藉的战场和废墟，但照片里同样没有出现尸体。⁵⁶这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关注点不同，更是因为环境所限。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了防止疫病，尸体很快就被掩埋，摄影师根本来不及拍摄。⁵⁷当然，也不排除罗伯逊会阻止年轻的比托拍摄这样的场景。截至1862年，美国内战的照片中也有很多拍摄了阵亡士兵，而且摄影师与当年的比托一样，为了得到画面感更强的照片，往往会重新摆放尸体的位置，把军械也做调整，让现场看起来更凌乱。⁵⁸

51 Max Dauthendey, *Der Geist meines Vaters*, 1912, pp. 95–6, as translated by Marie-Louise Berner, *Bertel Thorvaldsen: A Daguerreotype Portrait from 1840*, 2005, p. 99. Karl Dauthendey's principal patron at this time was the duke of Dessau.

52 See Audrey Linkman, *Photography and Death*, 2007, pp. 14–62.

53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pp. 29–31, 140. For Beato at the forts, see also Bennett, *History 1842–1860*, p. 147, and figs 121–3 (pp. 149–150, 152) for his photographs of the dead. An essay by Fred Ritchin, 'Felice Beato and the Photography of War' is in *Felice Beato: 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 Road*, by Anne Lacoste, 2010, pp. 119–32.

54 See Gordon Baldwin, Malcolm Daniel and Sarah Greenough, *All the Mighty World: The Photographs of Roger Fenton, 1852–1860*, 2004, pp. 19–31.

55 Luke Gartlan, 'James Robertson and Felice Beato in the Crimea: Recent Findings',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29, no. 1, Spring 2005, pp. 72–80 (who reattributes some of these images to Beato).

56 See B. A. and H. K. Hensch, 'James Robertson and His Crimean War Campaign',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26, no. 4, Winter 2002, p. 262.

57 For the technical procedures and challenges of wet-plate field photography at this time, see Sandweiss, *Print the Legend*, pp. 39, 122–8.

58 Davis, *Origins of American Photography*, pp. 183–7. See also Drew Gilpin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008, pp. xvi–xvii, 63–81, 275 (n.9). Anne E. Peterson, 'Alexander Gardner in Review', *History of Photography*, vol. 34, no. 4, November 2010, p. 357, thinks it likely that the Civil War photographer Alexander Gardner would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Fenton's Crimean photographs but not Beato's of China.